

◎ 领袖人生纪实丛书 ◎

人生纪实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

编

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周恩来

人生纪实

◎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
◎ 领袖人生纪实丛书
◎ 编

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第六编 开国总理

(1949—1956)

历 程

组建新中国首届“内阁”	509
协助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	515
抗美援朝	528
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536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540
为引进新技术倾注心血	549
出席日内瓦会议	556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	572
魅力挥洒万隆	583
对台湾进行争取工作	597
提出四个现代化	611

交 往

“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与十世班禅	617
用美国战俘交换——与钱学森	629
一清如水，难能可贵——与赵朴初	632
忘年交——与齐白石	636
知音——与李四光	643
怀仁堂里认同乡——与筱文艳	652

珍 聞

首次外交部之行	658
与中国铁路的不解之缘	664
治理淮河	667
居住 26 年的西花厅	670
三峡梦	673
与卓别林的交往	677
领导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	680
和各族学员欢度五一节	688
与泰国“儿童人质”	691

第七编 励精图治

(1956—1966)

历 程

知识分子的春天	697
在“反‘反冒进’”困境中	709
民以食为天	723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	735

为开展卫生工作而操心	747
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	758
中法建交	772
出访亚非欧 14 国	778
在四年调整时期	784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798
率中国民航飞出国门	806

交 往

琴瑟和音，相得益彰——与毛泽东	819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与李宗仁	825
“我一定帮你办到”——与朱启钤	833
“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与程砚秋	837

珍 闻

一位普通的观众	843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845
生育要有计划	849
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	853
会见“特殊”客人	860
西双版纳之行	866
视察舰艇部队	871
导演东方绝唱——《东方红》	875
亲临天山脚下	881
在邢台震区	885
三到大庆	895

第八编 鞠躬尽瘁

(1966—1976)

历 程

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	903
保护知识分子	917
“生产绝不能停”	923
领导草拟“四五”计划纲要	928
在“林彪事件”前后	930
叩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941
揭开中日关系新篇章	948
对统战工作呕心沥血	955
“全面整顿”的后盾	966

交 往

舍身“陪斗”——与陈毅	979
“你不要去，我顶着”——与贺龙	988
人类最高尚的灵魂——与谢觉哉	993
安排五次转移住地——与廖承志	998
大树荫深荫弱苗——与张治中	1007
临终召见——与罗青长	1009

珍 闻

“自己当起了铁道部长”	1011
平息武汉“七二〇事件”	1016
领导中苏边界谈判	1023
“送阜外医院”	1031

谈外语教学改革	1036
智捉“四大金刚”	1043
两个女民兵舞蹈的诞生	1050
175名将军的解放	1053
回延安	1063
参观云冈石窟	1065
“5·19”批示	1069
在最后的日子里	1072
魂归江河大地	1077
编后记	1081
说明	1082
摘编附注	1084



第六编

开国总理

(1949—1956)

历 程 //

组建新中国首届“内阁”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首届内阁筹组在即。

傅作义任水利部长

这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郑重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新中国首届内阁总理任命后，毛泽东责成周恩来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推动各项政府工作。周恩来不辱使命，早有考虑。

新中国建立后的人民政府，应当是多党合作的典范，应当具有广泛代表性。周恩来认为，作为刚刚执政的共产党，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士，应尽最大可能加以邀请并妥为安排使用。特别是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这样，有利于团结和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1949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向北平转移途中，召开了一次商议25日抵达北平后所要做的有关工作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就讲到了对党外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也在会上强调了对党外人士的安排问题——“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

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民主党派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不负众望，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感动了党外人士，赢得了他们对政府工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佳话。

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傅作义，于 1949 年 1 月 30 日率部接受和平改编。此后他还与时任绥远省主席的董其武一起，为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过重要贡献。毛泽东在西柏坡高兴地会见了傅作义：“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掉的！你还应留在政府里做官，为人民服务么！”

“你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战争。”周恩来也当场赞许他，表示欢迎与之合作，恳请他参加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议，筹备成立中央政府。因为“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之后，中共中央安排傅作义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此同时，周恩来又特意提名傅作义“入阁”担任水利部长，这正合傅作义的意愿。

为了表示对傅作义工作的支持，周恩来亲自调来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以协助其工作。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周恩来请傅作义推荐人选，他郑重地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个是曾任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的张含英，一个是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北平市长的刘瑶章。周恩来对李葆华等党组负责人指示道：“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干了 29 年；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多年以后谈及此事，傅作义仍感慨不已地说：“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

李书城任农业部长

1949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名李书城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并提议任命他为农业部长。许多人为之大惑不解：为什么要重用这样一个年近古稀、大家不甚了解的人呢？于是，周恩来当即对提名的理由作了一番说明。

李书城是湖北潜江人，曾考中秀才，后又接触西学。1902 年赴日本留学，亲聆孙中山革命主张，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武昌起义时曾任武汉国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后出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府秘书处军事组长兼陆军部顾问官，此后参加反

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20年至1921年，其胞弟李汉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在其上海寓所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本人支持国民党改组和实行国共合作，并参加北伐战争，因反对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大屠杀，拒绝参加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被以“倾共”罪名关押，获释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通志馆馆长等。抗日战争时主张抗日救国，曾一度避居成都。1948年在湖北发起反蒋和平运动，并赴长沙劝说程潜率部起义，1949年5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管会高级参议，同年底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作了详尽介绍之后，周恩来强调指出，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大家豁然开朗，对这个提名再无异议。

会后，周恩来又专门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一波，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名他为农业部长。”周恩来的关怀和信任使李书城十分感动，表示一定要尽力搞好工作，不辜负共产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以古稀之年刻苦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农业知识，为全力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炎培任副总理

工商界代表人物，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可是个倔犟老头。他过去一直恪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到北京，他也无意于做官。在中南海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曾问：“北洋军阀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现在，中央人民政府要请他出来担任公职，需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于是周恩来亲自出面了！他特意前往黄炎培的家中登门拜访，开始黄仍抱定初衷，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20多岁的老人，诚挚地劝说：“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经过两个多小时推心置腹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表示第二天再作回答。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一清早又去征求江泽、杨卫玉等好友

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若渴，如此盛情邀请，应该欣然接受，不能再推辞了。当晚，当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他的最后答复时，黄炎培乐呵呵地笑了，他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

黄炎培此举反倒使其子女感到难以理解。黄炎培严肃而中肯地告诉他们：“以往坚决拒绝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啊！”

林业专家梁希主政林垦部

当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初步拟定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会议上征询意见，著名林业专家梁希获悉自己将出任林垦部长，当即递了一个条子：“周总理，我年近 70，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马上给他回复了一个条子：“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很感动，慨然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熟悉梁希的人都知道，几年前国民党当局曾以请其执掌农业部大权或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为条件，诱使正在中央大学执教的梁希放弃反内战反独裁的立场，他甘冒被迫害甚至被暗杀的危险，断然加以拒绝。当时周恩来十分担忧梁希的安全，曾指示有关人员予以关注，梁希则凛然表示：“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的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梁希视旧社会官禄如粪土宁死不就，新中国面对人民委托万死不辞，这一憎一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梁希是建国以来林业专家主持全国林业行政第一人，早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农业部，后又曾赴德国进修森林利用和森林化学，是中华农学会创始人，先后在沈阳、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从事林业科研与教学，在我国最早开设森林利用、林产制造等课程，并最早对封山育林等育林手段进行科学调查和推广。他就任林垦部长以后，以高深的林学造诣和深入实际、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致力于林业发展规划、林业教育、林业科研的基础建设，为新中国的林业改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59 年他不幸身患绝症，在医院中还以抱病之躯写下了《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的文章，呼吁加速绿化祖国。

唯独不安排邓颖超

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机，在他综合平衡下，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差不多都被安排进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1949后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其下属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命。4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他们是：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	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	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	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	梁希
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	史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

这个名单一公布，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陈毅高兴地说，周总理平衡的这个班子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照顾到被安排人的资历、职业和能力。许多民主人士赞叹：“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然而，人们还是感到有遗憾：为什么不安排邓颖超“入阁”呢？在组阁过程中，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都众口一词地提出：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从资历、才能和代表性方面来看都应该入阁。但是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不予安排。他三

顾茅庐，请民主人士一个个出山，就是不让邓颖超入阁。

对此，当时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卫戍司令彭干臣烈士的儿子彭伟光，1955年在他撰写的《西花厅见闻》一文中披露：我母亲认为，邓大姐除了是总理的一个贤内助外，还应该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所以我母亲问总理：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到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当时周总理很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这个老太太想得还挺多的呀！这个问题不是你第一次提出的，过去已经有人提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内外人士都这么提过，甚至还有人劝过我，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新中国首届“内阁”——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自此，周恩来担负起处理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到1976年1月逝世，他在共和国总理的岗位上任职长达26年。他逝世后，联合国下半旗为他致哀。

协助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

1950年1月10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凛冽的寒风中，周恩来登上停靠在戒备森严的站台上的专列，开始了他建国后的第一次苏联之行，这也是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周恩来此行，是奉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之命，前去参加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商谈有关中苏两国签约的事宜。

一个多月前的1949年12月6日，在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周恩来送毛泽东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这是毛泽东首次对苏联的访问。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斯大林70岁寿辰庆祝活动，并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以及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

然而，当毛泽东、斯大林这两位伟人相见后，由于种种原因，两人的谈话不是那么投机和融洽。

毛泽东提出：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一起签署商务、借款、航空等方面协定。

毛泽东叫周恩来去有他的考虑。毛泽东深知在与外国人谈判打交道方面，周恩来更在行些。他曾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对于周恩来，斯大林并不陌生。除了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得力助手外，斯大林对周恩来卓越的谈判才能及其他方面也早有耳闻。

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因坐骑受惊摔伤，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把他送往苏联治疗。尽管接待工作是共产国际负责的，但斯大林对此事非常关注。在苏联疗伤期间，周恩来仍然坚持工作。他给共产国际起草了长达55 000余字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汇报了中共各方面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出院后，周恩来又根据备忘录向共产国际执委作了一次口头报告。共产国际执委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经修改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斯大林很重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

经过一二十天的研究讨论，以共产国际名义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的决议》。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将这一决议交给周恩来时解释说：周恩来的报告斯大林看了，国际执委会关于报告的讨论情况也向斯大林汇报了。斯大林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国问题进行了极其严肃的研究和讨论，并且十分审慎地从各方面考虑了中国问题。这个决议是在斯大林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

季米特洛夫还特意解释说：本来斯大林很想接见周恩来并面谈一切，但是，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来往甚密。这次周恩来是由共产国际接待的，如果斯大林要接见周恩来，就不能回避接见国民党的外交人员，但他又不愿接见他们。因此这次就不见面了，希望周恩来谅解。

然而，这一次，斯大林对毛泽东要请周恩来到莫斯科表示难以理解。按斯大林的想法，不管中苏之间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而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字。

斯大林没能猜透毛泽东的意图。他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周恩来）来？签个声明，外交部长没有必要来。”

毛泽东没有回答斯大林的问话。

两位伟人各自按着自己的思路思考自己的事情。会谈遇到了难题。

12月24日，斯大林同毛泽东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闭口不提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心里很不愉快。

此后，前来苏联参加给斯大林祝寿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先后回国，只有毛泽东还滞留在莫斯科的豪华别墅里，看一些由苏联方面安排放映的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消磨时光。斯大林也避而不见毛泽东。

对这一国际交往中罕见的现象，周恩来后来曾指出：“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地接待，但是还不如刘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样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外，无事可谈。”

对苏联的这种大国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不信邪的毛泽东也颇有些怒气。毛泽东后来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